

深职院成功申报文博会分会场

深圳文博会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是促进和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博览和交易平台。文博会除设在会展中心的主展馆外，还设有分会场。作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会场已经成为推动文博会快速发展、促进交易、提升质量的重要支撑。

学校作为首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积极推行“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的办学模式，确立了“文化育人”为核心的育人理念。为推动深圳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也为了满足“设计之都”的人才需求，学校设立和组建了艺术学院、珠宝学院、动画学院、媒体学院、人文学院等五个文化艺术类二级学院。近年来，学校在文化艺术、创意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优异的成绩。鉴于深职院扎实的办学基础和精心的前期准备，日前，文博会组委会已正式认定深职院创意中心为文博会分会场。这必将对学校办学水平、服务地方经济与发展等各方面起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学校对筹办文博会分会场工作高度重视，为成功举办各项展览、交易活动，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精心策划展览方案，创新办会模式，协调相关单位加强统筹合作。

根据筹展方案，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活动时间为5月14日-19日。届时，留仙洞校区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文化引领、服务产业”这一主题，拟邀请与深职院联系较密切的中华职教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共同举办，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暨文化创意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师生创意作品展、“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高端论坛、“创意设计服务”、“创意咨询与培训”等19个活动项目。以上活动将在图书馆、音乐厅、知行园A座、知行园B座、学思楼、四方广场等地分别展开，展场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项目，将使深职院分会场成为一场高水平的文化创意作品展览和交易盛会。

(产学研用促进处)

第十届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大幕开启

第十届文博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创意中心分会场今日启幕。14日-19日，深职院会同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以“文化引领、服务产业”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深职的文化创意活力、产学研融合实力以及文化育人成果，整个深职校园变成了盛大的文化创意嘉年华。

深职院分会场的活动包括文化创意与技术服务项目签约仪式、文化创意产品展、文化创意技术服务展、文化创意人才展、文化创意培训认证展、文化创意论坛等几个大类，共计19个项目，展场主要位于留仙洞校区，总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项目涉及艺术创意作品展销、珠宝鉴赏、数码仿真制作、数字印刷、微电影、人才推介、技术咨询与服务以及文化创意论坛等众多领域和形式。

14日上午，学校高朋满座，嘉宾云集，俭朴庄重的开幕仪式在留仙洞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张效民，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国强，深圳市纪委派驻十一组组长林冰，中华职教社副总干事杨农，广东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广东省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方诚，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李平，南山区常委、宣传部长陈军，南山区副区长曹赛先，南山区文产办主任程红坤，深圳市教育局高教处处长许建领等政府、行业、企业、兄弟院校的领导、嘉宾和师生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美好时刻。

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创意中心分会场组委会主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致开幕辞。在14日的签约仪式上，刘洪一与31家公司、机构分别签订了32项合作协议。同时，媒体学院被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授予“教育培训推广基地”、被中国印刷科技研究所授予“深圳研发合作基地”牌匾。刘洪一代表学校应用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为“安得利深圳食品有限公司‘美学生活实验室’”、“深圳市壹点壹刻食品有限公司‘西点文化研发中心’”揭牌，代表艺术设计学院为“深圳市钟表研究院‘产品创新设计中心’”揭牌。

（宣传部）

“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论坛圆满举行

5月14日下午，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论坛在留仙洞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27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主题，展开热烈研探，共襄文化创意和协同育人的大计。

作为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的重要专题活动之一，本次论坛由深职院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张效民，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副总经理李平，广东省创意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方诚，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康延，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王受之，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陆定邦，深职院副校长唐晓鸣等出席论坛，行业、企业、兄弟院校的领导和嘉宾和师生代表500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由唐晓鸣主持，职教所承担了会议策划与安排等工作。

论坛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

张效民在致辞中说，深职院联合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第十届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是高职教育践行政校行企开放联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重大举措，也是高职教育文化引领和服务产业发展的集中体现。本次论坛突出了高职教育协同育人特色，加强了与全国高职院校和有关行业企业的合作，将有力推动对高职教育文化引领与协同育人的研究与实践，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表示，学校将进一步发挥特区高校智力、人才和技术优势，更好地服务深圳乃至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于殿利在致辞中指出，本届文博会在深职院设立文化创意分会场，凸显了现代职业教育和高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对推进高校的教育改革，促进产学研的高度融合，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他希望各位专家能在论坛上提出真知灼见，为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出谋划策。

海峡两岸专家报告观点新颖

围绕论坛主题，5位海峡两岸文化创意领域的权威专家在论坛上发表了讲演。杨农教授作了题为《以市场力量推动文创育人》的主题报告。他从市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配置人力资源必然相应配置职业教育资源、国家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需要以市场为动

力开展文创育人和基于文创概念的市场育人等五方面阐述了市场力量对于文创育人的重要性。

陆定邦教授作了题为《高校设计教育与产业应用》的报告。他以台湾成功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设计教育模式为对象，以实际产业设计案例阐述了实用型和前瞻型设计教育的规划理念和实施模式，指出设计教育应贴近生活与产业，引领科技和政经发展。

王受之以《关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为题，提出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文创的产业定位基础和服务于文创产业的人才培训。他还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核心层和文化创意绿色层两大类型阐述如何培养文化创意人才。

方诚以《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新理念和新模式》为题，通过省创意产业协会成立的创意创新创业联盟为例，强调文创产业是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是文化在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领域中的创造力。

邓康延以《新古典动画片——〈老课本讲故事〉》为题，介绍了民国时期小学教育的历史背景，再现了民国课本的文浅意深与细微宏阔以及真善美的文化启迪。

各专家观点新颖、精辟入理，对文化创意与协同育人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受到与会代表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党委宣传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来深职院视察

4月3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一行来深职院视察，就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与建设进行调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主委陶凯元，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王建国，民进广东省委秘书长李小琴，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深圳市委主委张效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庆节，深圳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军旗、副院长赵屹东等人陪同调研。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副校长万金保、唐晓鸣、杨润辉、温希东等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洪一简要汇报了学校的整体概况，并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从现代职业教育内涵模式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建设两个方

面重点阐述了深职院近年来不断探索职业教育改革所做出的努力。他表示，学校始终坚持高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特色，积极应对产业转型升级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高度的创新使命变革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推进“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系统改革，努力打造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模式。他还从职业教育目前面临的困境出发，介绍了学校开办四年制高职专业、与深大联合培养应用型本科生、中高职三二分段对口自主招生和五年制专科生培养等四项探索和实践，并对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五点思考与建议。

随后，深职院文化育人办公室主任谭属春、经济学院院长查振祥、计算机学院院长孙湧、教务处处长窦志铭、医护学院院长李月等分别结合自身实际，就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等问题畅谈了心得。

严隽琪一行认真听取汇报后，对深职院近年来的理念创新、实践探索和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她说，深职院不仅硬件条件好，而且办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特别是在深圳改革开放特区的背景之下，学校这种不满足的改革精神、扎实的工作作风都值得赞赏。刘洪一校长“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的办学理念值得在高职教育界推广。严隽琪指出，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加快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发展的好坏是衡量教育综合改革是否有成效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她从教育理念、教育体系和教育政策三个方面阐述了职业教育存在的意义和职业教育的宗旨。她最后表示，中国民主促进会将十分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十分支持深职院的改革创新，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深圳大学城、深圳大学和深职院的民进支部基层会员以及深职院部分职能处室领导，二级学院院长和教师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党委宣传部)

刘洪一出席 2014 高职素质教育学术论坛并作专题发言

2014 高职素质教育学术论坛暨高职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于 4 月 18-19 日在杭州举行。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发言，介绍深职院“三育人”系统改革的做法与成效。

本次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主办，会议主题为“素质教育与高职教育的使命”。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教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教育部职成教司司长葛道凯，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等出席会议。全国 83 所高职院校党委书记、院长、副书记、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近 2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 18 日上午的会议上，中国高教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作了《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主旨演讲。4 月 19 日上午，大会进行专题发言。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首先作题为《素质教育的整体设计与推进——深职院“三育人”系统改革实践》的发言，简要介绍了深职院近年来全面推行“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系统改革的做法和成效，引起与会专家和高职同行的强烈共鸣。

葛道凯司长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素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其中之一、重要贡献和基本责任，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着力点。高职院校领导们要挺起胸脯，发挥好高职教育的重要作用，迎接职业教育春天的早日来临！

（党委宣传部）

王荣、许勤高度评价 深职院与吉安职院合作办学工作

近日，吉安市委市政府就深职院与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办学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情况致信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向深圳市委市政府表示感谢，对深职院务实高效的作风和先进的办学理念表示赞赏。王荣书记高度肯定深职院与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工作，特批示：实实在在支持老区发展；许勤市长在批示中也明确表示：对深职院为加强特区与老区的合作所做的工作，应予以肯定。

据悉，为大力支持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工作，助推老区发展，去年7月和今年4月，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曾先后两次亲自率队远赴吉安，就两校合作办学的内容及形式进行充分地磋商，并分别与吉安市市长胡世忠签署了对口支援协议和深度合作办学协议。今年年初，深职院领导班子还在反复优选的基础上，确定了钟江生等4位同志赴吉安职业技术学院担任院长、副院长等关键职位，两校合作开启了新的阶段。

吉安市委市政府在来信中提到，4位同志一到吉安就迅速进入工作岗位，抓紧开展工作，体现了深职院务实高效的作风和先进的办学理念，因此特代表吉安市委市政府和老区人民，向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职院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刘洪一表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加强合作，是学校的荣耀，更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将以高度的历史担当，紧密按照两地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扎实推进两校合作，为老区建设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党委宣传部）

刘洪一出席第六届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

教育部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讨会于5月12日至1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2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一主题展开研探，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迈向新阶段。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教授作为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应邀出席会议并致辞。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叔子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张岂之、王义遒等领导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张大良在讲话中明确了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文化素质教育始终这一重要精神。他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要在创新教育方法、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上狠下功夫，加强教指委和基地建设，努力构建更加有效的指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刘洪一在会上致辞。他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杨叔子院士对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向与会领导专家介绍了职业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整体情况——

2011年11月，高校文化素质教指委和高职高专文化教育类专业教指委在深圳联合举办了首届高职教育文化育人高端论坛，成立了全国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协作会，突显了高职院校日益成长的文化自觉。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教育文化育人高端论坛已成功举办3届，参与院校越来越多，成为高职教育文化育人理念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引擎。2012年，教育部授权深职院牵头组建了“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完善了相关章程和制度性文件，着手起草《全国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纲要》。2012年，深职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文化育人》杂志，现已出版2期，成为研探文化育人的高端平台。刘洪一希望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教指委能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深入发展。

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如何面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贯穿到文化素质教育之中进行了研讨。周远清、张岂之、李培根、王义遒等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清华大学、石河子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代表在会上作经验交流。

(宣传部)

香港教育代表团访问深职院

4月18日，由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办，浸会大学学校领导课程同学会协办共同组织的香港中学师生代表团一行14人访问深职院。副校长杨润辉会见了代表团，港澳台办副主任樊大跃参加了会见。

杨润辉热情欢迎香港教育评议会、浸会大学学校领导课程同学会以及香港各中学校长、主任和学生访问深职院，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绩，重点介绍了学校与香港交流与合作情况，表示全力支持香港教评会、同学会以及各中学与深职院开展各类交流活动。港澳台副主任樊大跃详细介绍了学校招收香港学生的两个途径：凭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二级免试入学以及参加学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具体实施办法。双方还就深职院到香港各中学宣讲进行了磋商，并确定了基本时间和宣讲学校。

本次香港教育代表团访问是继2013年教评会主席率团访问深职院之后的第二次交流活动，今后将通过交流常态化，扩大香港来访学校范围，丰富交流内容等途径让更多香港学校、师生和家长了解和选择深职院。

(港澳台办)

贵州省教育厅教育学习团来深职院考察交流

4月21日上午，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霍健康率贵州省教育厅教育学习团一行8人，在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学明、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范坤的陪同下，来深职院考察访问，交流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商讨对口支援相关事宜。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副校长温希东、张效民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1会议室与客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贵州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奇勇，党组成员、副厅长级督学邹联克，办公室主任王友，民族教育处处长黄燕，民办教育处处长宋黔萍，黔南州教育局常务副局长欧开灿，毕节市教育局局长赵昌伦，广东省高教处副处长王魏锋，深圳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毛华伟，市高教处干部颜辉，深职院继培学院院长付小平、副院长梁快参加了座谈。

刘洪一对深职院基本情况和学校近年来“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改革和内涵发展情况作了介绍。他介绍了近年来深职院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重点介绍了深职院对口支援贵州省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深职院累计对口贵州中职院校140所，培训了骨干教师及管理干部315人；对口支援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和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等贵州高职院校14所，累计培训教师143人、培养学生511人，援助范围涵盖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训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训、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圆满完成了相关对口支援任务。2012年，深职院完成首轮对口支援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的任务，2013年4月，深职院再次与毕节职院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对口支援协议，目前双方已就下一步对口支援合作达成了共识，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市教育局副局长范坤简要介绍了近年来深圳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随后，贵州省教育厅教育学习团一行了解了深职院专业和课程建设、校企合作、小语种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招生录取等方面的情况，并详细询问了深职院和深圳市对口支援经费等有关政策。对于有关问题，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学明、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范坤，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副校长温希东等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贵州省教育厅代表团希望

双方今后能通过委托培养大学生、互派干部挂职、加强师资交流和培训等方式继续深化合作，抓紧推进与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新一轮对口支援相关工作任务。

霍健康厅长高度赞扬了深职院办学成绩，并且对深职院多年来对贵州省职业院校的无私帮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一流的，他深刻感受到深职院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大”，拥有五个校区、三万余名学生、七十多个专业、20余年的发展历程……整体办学规模大；二是“强”，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师资队伍、强大的应用研发实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综合办学实力强。他表示，此次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访问学习收获很大，希望与深职院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借助广东省、深圳市和深职院的教育改革经验进一步提升贵州省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校长办公室)

外研社蔡剑峰社长一行来深职院考察交流

5月15日上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蔡剑峰社长一行来深职院，专程在深职院参观第十届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并就文化素质教育领域合作事宜进行交流访问。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在留仙洞校区与客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考察期间，蔡剑峰社长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展合作的具体问题与刘洪一（教指委主任）进行了沟通交流。作为5月8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北京合作交流洽谈会的延续，刘洪一与蔡剑峰就合作的有关细节达成了基本一致，并决定于近期着手流转有关程序。

(产学研用促进处)

浙江机电职院党委书记左家奇一行来深职院考察学习

5月16日上午，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左家奇一行来深职院，专程参观考察第十届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的举办情况，并就社区管理专业、文化事业管理、音乐表演等文化艺术类专业建设事宜进行交流访问。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三楼贵宾室与客人进行了交流，经济学院、人文学院、产学研用处负责人及社区管理专业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

刘洪一详细介绍了本次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的办会主题和内涵，以及分会场的几个大类活动和特色项目。刘洪一和左家奇还就明年依托深职院分会场这一平台，联合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动全国职业院校共同参与举办文化艺术盛宴达成了一致意见。

(校长办公室)

菏泽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乔廷龙一行来深职院考察学习

4月22日上午，菏泽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乔廷龙一行来深职院，专程就教学工作与校企合作事宜进行交流访问。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副校长万金保在留仙洞校区101会议室与客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产学研用处副处长胡延华参加座谈。

刘洪一介绍了学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教育自觉和创新自觉，全面推动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系统改革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探索，同时介绍了深职院开展境外交流与合作办学的一些基本情况。万金保介绍了深职院教学工作基本情况，并着重阐述了深职院专业设置情况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胡延华就深职院与企业之间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几种方式进行了介绍。

(校长办公室)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陈承茂一行来深职院学习调研

4月23日，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承茂一行7人来到深职院，专程就党建思政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内容进行了调研学习。

刘洪一校长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表示深职院非常重视与兄弟院校的来往，希望大家可以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双方代表就拓展专业课程，辅导员引入方式、培养及晋升方向，党建组织工作创新，学生党员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进行了交流。

(校长办公室)

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考察文博会深职院分会场

5月16日，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德信等一行5人来深职院考察，对文博会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以“文化引领、服务产业”为主题的各项展示成果表示赞赏，对深职院紧密贴近市场需求、着力培养文化创意人才、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办学模式表示高度认同。

正值文博会期间，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陪同孙东生一行考察了深职院创意中心分会场。孙东生一行重点参观了文化创意产品展、文化创意人才展、文化创意技术服务展。

(宣传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崔世广教授莅校作学术报告

作为深职院“立足应用·科研强校”学术活动月活动之一，应用外国语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崔世广教授于4月23日下午到深职院作题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变迁”的专题学术报告。应用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马俊波到会致欢迎词，日语专业主任韩勇主持了这次报告会。

近年来，中日之间摩擦不断，特别是当前钓鱼岛事件不断升级、安倍首相献祭靖国神社、加上由来已久的历史认识问题等原因，中日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让我们在省思中日关系结症的同时，也在思考日本国内民众当前主导的社会思潮究竟是什么，日本国内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崔世广教授根据历史的脉络一一剖析了日本民众中存在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分析了这三种社会思潮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此起彼伏的力量消长；指出随着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日渐凋落，保守主义思潮被民族主义思潮所取代，民族主义思潮占据支配地位；提出日本的民族主义志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改变战后发展道路，坚持美化侵略历史立场，煽动针对中国（以及韩国）的排外主义，必将对日本的未来和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给以特别的关注和警惕。

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与会的老师们踊跃发言，讨论热烈。闻讯赶来的日语专业部分学生也认真聆听了本次专题报告会。

（应用外国学学院）

马敬言教授一行访问深职院并合作举办 “绿色教育”学术研讨会

5月8日上午，深职院迎来高级校事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及技术教育及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教席（双教席头衔）、香港教育学院终身学习研究与发展中心总监 Rupert Maclean（鲁伯特·麦克林，中文名：马敬言）教授。他在联合国教科文职教联系中心（UNESCO-UNIVOC）香港教育学院分中心主任、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副教授 Margarita Pavlova 博士的陪同下访问了深职院。杨润辉副校长在明德楼会见了来访客人，并就双方的合作进行了亲切和富有成效的会谈。港澳台办副主任樊大跃等参加了会见和会谈。

杨润辉简要介绍了深职院近年来的发展成效。会谈中，双方就深职院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参加联合国教科文职教联系中心（UNESCO-UNIVOC）今年10月14-15日在波恩举行的教科文职教联系分中心会议、深职院作为教科文职教联系分中心与香港教育学院分中心之间的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

马教授表示会视深职院发展的需求，全力配合，同心协力，积极促成深职院愿为的项目。继而，香港教育学院分中心主任 Margarita Pavlova 博士就双方教科文职教联系分中心的合作问题上，更是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包括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合作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硕士培训课程（在职2年）、开展在职人员继续教育需求及趋势问卷调查、进行企业对员工创新技能需求及职业技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共同参与香港与德国及欧盟建筑工程教师革新项目等。

深职院对对方提出的建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表示会抓紧时间做好调研及协调，结合深职院发展的需求，确定合作参与的项目，及时反馈对方。杨副校长表示，学校十分愿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及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心，强化交流，在交流与合作中进一步提高深职院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学校国际化快速发展。

9日上午，港澳台办和职教所抓住香港教育专家来访的机会，在明德楼合作举办了绿色教育学术研讨会。学校港澳台办、职教所和文化育人办公室及人文学院的部分教师参加了研讨。

研讨会上, Pavlova 博士先简要解释了什么是绿色教育, 之后以“如何使职业教育更加绿色—对亚洲区域比较研究的反思”为题介绍了她多年研究的成果和认识。她指出, 尽管国际组织对绿色教育有相关的定义, 但是各国因社会、经济及文化的不同, 对该定义有不同的理解。绿色教育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议题, 它以经济、环境、人文为三大支柱, 探究人类可持续发展。作为学校, 不仅要考虑如何通过师资、课程、活动开展绿色教育, 还需要通过师生的亲力亲为, 营造学校的绿色校园, 并积极投身绿色科研、绿色实践, 最终实现绿色办学。Pavlova 博士通过详实的案例和数据分析向与会者展示了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在绿色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实践和认识。职教所刘兰平所长对欠发达地区开展绿色教育进行了回应。

研讨会上, 深职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宋晶博士也做了题为“将绿色工业文化融入职院校园的思考”演讲。她我们从我们周边的环境、绿色工业文化、绿色工业文化融入职业技术教育等角度介绍了多年研究的成果。

两天的活动开启了深职院与香港教育学院合作的新篇章, 也平添了深职院同样作为联合国教科文职教中心深职院分中心参与国际合作的动力。

(港澳台办)

加拿大兰加拉学院客人来深职院访问

4月24-29日, 加拿大兰加拉学院社会科学与管理系主任 Leelah Dawson 一行4人来深职院访问。

杨润辉副校长在4月24日下午会见了客人, 并介绍了深职院近些年发展的情况。双方共同回顾了两校几年来的交流与合作。Dawson 主任表示, 兰加拉学院非常重视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 他们欣赏并高度认同深职院的办学理念。深职院在建校短短的21年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 作为深职院的合作伙伴, 兰加拉学院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此次 Dawson 主任一行来访的目的旨在进一步考察深职院并了解深圳的整体情况，对明年派兰加拉学院学生来深职院学习进行前期的调研。考察期间，客人与学校管理学院、外语学院部分教师以及外事处相关人员就研修课程的设置及总体安排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讨。我方各位主讲教师就各自负责的题目与对方进行了交流，涵盖深圳前海经济区发展、绿色物流、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客人对整个项目的设计和主讲教师的精彩阐述高度赞赏。项目中还涉及了汉语教学、企业参观、文化考察等内容。Dawson 主任一行还参观和考察了深职院的合作企业以及深圳的文化景观。客人临行前表示此次考察收获颇丰，整个研修项目的设计周密、内容丰富、安排细致，同时对深职院的办学实力和师资水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该校准备在 2015 年 5 月派 2 名带队老师及 15-20 名学生来深职院学习。

两校于 2011 年 5 月签订合作备忘录。2012 年 10 月 27 日，深职院曾选派 13 名学生赴该校学习。

(外事处)

2014 年省级技能大赛在深职院顺利举行

由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承办，联想集团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 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三网融合与网络优化、基站建设维护和数据网组建、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于 5 月 10 日在深职院体育馆顺利举行，比赛期间，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吴念香、温希东副校长、窦志铭处长、马晓明院长等人对大赛赛况进行了视察，并对本次大赛进行了高度评价。

本次广东选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 27 所职业院校的 55 支参赛队伍，156 名参赛选手，108 位指导教师，邀请了来自联想集团、中兴通讯公司、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平安银行网络中心的 20 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裁判。选拔赛分为上下午两场进行。竞赛采取团队比赛方式，每个参赛队由 2-3 名学生队员参赛。考试内容均按照国家比赛的要求进行，大赛对选手水平有较高要求。

栏目 / 深职院信息

比赛现场，每个赛区都有工作人员严格把关、认真巡视，保证大赛的公平性。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每一步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各支队伍合理分工，在展示高超技能的同时还体现出团队精神。

(电信学院)

- 深职院当选深圳市设计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 全国职业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大赛深职院学子喜获二等奖
- 深职院学子获省中餐主题宴会设计选拔赛一等奖
-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英语口语比赛 深职院学子喜获一等奖
- 广东省导游服务技能选拔赛深职院管理学院学子喜获3个二等奖
- 朱方来教授获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
- 深职院创意工作室将亮相文博会
- 深职院学子新锐微电影文博会初试啼声
- 第六届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广东区选拔赛深职院取得骄人成绩
- 印刷传媒科技与标准化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亮相深职院文博会创意中心分场

(深职院信息)

教育部：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完善中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针对“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退出统考”的传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1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特别是高考改革事关千万学子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十分重要、十分复杂、十分敏感。目前，教育部正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

“方案力求充分考虑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周期性和长期性，先试点后推广，以积极稳妥地有序推进。”续梅说。“方案确定后，我们一定会及时发布，按照三年早知道的原则，方便考生和家长了解。”

自17日开始，有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将退出统考”的报道成为关注热点。记者18日午间电话采访了正在杭州出席学术会议的顾明远，他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自己对高考英语改革的理解：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是改革方向，现有的计分体系造成分分计较，考生差一分就排一操场，不公平，也不科学，因此我们很多专家都主张英语实行等级计分制，并以多次考试中的最好成绩计分，这绝不等于高考不考英语，也不会削弱目前的英语教学，因为高校招生录取时对英语等级仍会有要求，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高校的要求可以有所区分。

去年，教育部曾表示拟于2017年实施高考改革试点。“当时教育部是根据三年早知道的原则，宣布的这一时间节点，但是高考牵系重大，目前方案尚未确定，因此有关改革的一切都要以相关部门的正式公布为准。”顾明远说。

已卸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顾明远参与了关于高考改革的相关调研和方案论证。

（《新华社》2014年5月18日）

职业院校学生阅读能力调查

职业院校学生阅读学习现状

阅读动机

调查结果显示,在2012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以消遣娱乐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6.5%和58%;以增智益思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37%和49%;以巩固专业知识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21%和41%;为了考级(证)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和63%。而在2011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以消遣娱乐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63%和52%,以增智益思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52.5%和61%;以巩固专业知识为阅读动机的学生比例分别是23.8%和47%;为了考级(证)的学生比例分别是13%和67.7%。

以上可以看出,职业院校学生的阅读动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把阅读当作消遣娱乐的现象较为普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提升,这个数据是下降的。二是把阅读当作启迪智慧和开阔视野的途径学生并不多,这和学生进入职业院校前的阅读教育目标不相符,也和公众对阅读的认知有很大差异。三是以巩固所学专业知识和考级考证需求为动机的学生在2011级三年制大专学生中居多,说明三年制大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五年制学生(中专阶段)高,有再学习的愿望。

阅读兴趣

从调查结果看,职校学生的阅读兴趣淡薄,对阅读的认识有偏差,普遍缺乏利用图书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2012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对课外阅读没有兴趣的学生比例分别是49.3%和41.3%;认为阅读不如玩电子游戏有意思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4.5%和69.5%;认为阅读对未来发展没有多大用处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7%和43%;把阅读当作浏览资讯和明星八卦的学生比例分别是86.5%和77%。而在2011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对课外阅读没有兴趣的学生比例分别是43%和29.7%;认为阅读不如玩电子游戏有意思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3%和67.5%;认为阅读对未来发展没有多大用处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0%和40.8%;把阅读当作浏览资讯和明星八卦的学生比例分别是79%和71.5%。

阅读经历

本次调查的阅读经历是指学生在进入职业院校前的阅读生活经历。在商洛职业技术学院2012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经常阅读课外读物的学生比例分别是3.8%和5%;家长

支持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比例分别是 3%和 3.6%；经常进图书馆（每周一次以上）的学生比例分别是 0 和 0.3%。而在 2011 级五年制和三年制学生中，经常阅读课外读物的学生比例分别是 6%和 4.6%；家长支持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比例分别是 4%和 2.7%；经常进图书馆（每周一次以上）的学生比例都是 0。

调查结果显示，职校学生严重缺乏阅读经历，这可能与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有关系，农村学校的图书馆建设落后，而且学生进入职校前的学习阶段，多以学习文化课为主的，很多农村学校根本没有对学生提供图书馆教育。

阅读态度

在对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2012 级和 2011 级学生阅读态度的调查中，学生表示愿意接受图书馆教育的比例分别是 86.7%和 83%；希望图书馆经常推荐读物的比例分别是 91.2%和 83.7%；希望学校经常举办读书活动的比例分别是 92%和 90%。由此可知，职校生虽然在阅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对待阅读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有接受图书馆教育的愿望，有参与图书活动的热情。

提升高职大学生阅读能力的对策

从调查的各项结果看，高职学生的阅读状况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良好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品位，没有通过阅读解决问题的思想意识和能力。对职校生来说，这种状况无论是对眼前的学习，还是对未来的职业发展，都是很不利的。虽然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型的职业人才，但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知识、技术的更新日新月异，尤其是面对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光凭已有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职校生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养学生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使其成为出色的终身学习者。

积极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现代职校生以“90后”为主，他们思想活跃、想法新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同时也存在着依赖性强、目标缺失、做事缺乏持久性等缺点。调查发现，职校生普遍对阅读的认识狭隘，也没有形成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不懂得如何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需求与职业意向去深度利用图书馆资源，在缺乏专业培养和引导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悟”出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方法。因此，职业院校必须根据职校生的心理特点、学历层次、所学专业和未来人生职业发展方向，对其进行阅读指导，帮助

其树立正确的阅读理念和方向,学会选择健康、适用的信息资源,学会用科学的阅读方法获取信息、评价信息、转化信息。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在职校生中开展阅读引导、阅读方法的培训教育、信息检索教育,激发职校生的阅读兴趣。

鼓励职校生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90”后的职校生喜欢新鲜事物,敢于表现自己、乐于从众,所以我们鼓励学生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中,在学生中成立“阅读推广社团”,由社团成员设计或参与设计阅读活动方案,这样易于提高学生的阅读。也有助于利用同伴影响的作用。在活动的筹划中学生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更加容易推选出学生喜爱乐于参与阅读活动方案,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并在全体师生中起到良好的宣传和推广效应。

搭建互动交流平台

由于图书馆管理员不直接参与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因此,为了解学生的文献需求、阅读动向和阅读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利用这个平台,促进馆员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使学生的文献需求和馆员的文献服务对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广大职业院校而言,人才培养目标不仅包括熟练掌握专业技能,还要掌握自主学习、自主创新能力。学校教育毕竟是阶段性的,具备阅读能力,实现再学习则是终身受益的。因此,职业院校要针对职校生的自身条件和生理特点,不断加强他们的阅读学习能力培养,赋予他们利用图书馆实现再学习的能力,真正培养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专业技能人才。

(《教育与职业》2014年第13期)

数据称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高于重点大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发布《2014年教育蓝皮书》。令人意外的是,数据显示,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高于“211”(包括“985”)重点大学的75.5%。从学历层次来看,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9.7%,比本科生的67.4%高出12.3%。

就业率

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出现新的特点。

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据规模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从学历层次来看,

就业状况具有初次就业率“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博士生和硕士生初次就业率最高，紧接着是专科生，本科生最低。从学校类型来看，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最低。

在江苏，这一现象也有体现。截至目前，江苏已连续4年呈现出学历和就业率倒挂的现象。例如，2013年江苏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率为82.53%，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6.59%，专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8.56%。

男女生的就业率差距明显，其中男生初次就业率为77.3%，女生为65.9%。同等学历男生薪水的平均值比女生高15.7%。

南大新传院大四学生刁颖感同身受，她说，周围的同学应聘一些单位时，对方明里暗里都表示只招男生，不喜欢女生。南理工就业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些单位考虑出差，要求本科生一进去要到车间艰苦的地方，所以对女生需求小一些。

报告指出，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原因主要是所从事的职业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

起薪

高职学生平均起薪 3291 元

“211”高校 3157 元

从学历层次来看，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但学校层次高不一定直接带来高收入，“211”重点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157元，低于高职院校的3291元。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陆柏寒就读酒店管理专业。班里有15个女生和15个男生，“实习期在酒店餐饮部门的同学每个月实习工资1700元，在礼宾、前台、客房等部门，实习工资是1500元。”他说，因为专业对口，感觉专科生比本科生更好找工作。

此外，就业地区之间的毕业生起薪地区差异较大，其中，京津沪为5419元，东部地区为3148元，中部地区为2882元，西部地区为3167元。

招生

高职招生规模下降

部分专业重置率高

《教育蓝皮书》指出，近年来，高校招生数并未有明显下降，而是仍然保持平稳增长，但高职招生规模下降。2012年，高职(专科)院校招生255.0万人，比上年减少2.9万人(1.1%)。

此外，公民办高职在校生数、招生数全部开始下滑。从不同省份来看，2009-2011年，

全国有15个省市高职招生数保持了增长,另外16个省市全部出现了下降的情况。江苏出现在下降的16个省市中,降幅为3.75%。

此外,《教育蓝皮书》还指出,高职专业重置率较高,财经类、电子信息类、文化教育类等重置率在60%—80%。

相关新闻

江苏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国第一

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占GDP比例为4.28%,2013年5月,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评估认定启动,已有293个县(市、区)通过国家教育督导部门的评估认定。江苏是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最多的省份。

但整体而言发展并不平衡,东部地区达到均衡评估国家标准的县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塌陷”的现象比较明显。农村教育仍是短板,基层反映经费不足、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农村教育长期未能解决的基本是教师问题。

(《腾讯网教育频道》2014年5月14日)

生源减少高职院校面临“洗牌”

“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学院招生工作越来越陷入困境,今后随着几百所本科院校转向职业教育,生源会越来越少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赵庶吏告诉记者。据了解,北京市今年的高考报名总数为70517人,比去年减少2219人,降幅为3.05%。据初步预测,今年的录取率将在80%左右,但大多被本科院校“瓜分”。“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大批高职招不满生源的状况。”赵庶吏担忧地说。

“前几年中职出现的‘生源荒’,如今已经蔓延到高职。再加上,600所本科要‘转型’,高职升本的机会几乎为零,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夹缝中生存。高等职业教育‘重新洗牌’是早晚的事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主任邢晖认为,高职院校面临“新政”冲击,“尽管对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性,高职院校仍旧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本科院校有学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要应对生源危机,突出重围,只能贴近市场,办出特色,接受市场检验。”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主席、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李进则认为，对于新政冲击，高职院校不必过于担忧：“一定要有定力和良好心态，本科转型并非抢生源来了。本科转型是为了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各级各类人才都需要，高职院校要做的就是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培养人才。”李进认为，教育改革并非学校一家之事，“方方面面的改革都要根上，比如用人单位要转变‘唯学历’的用人标准，现在就业难，并非企业不需要人才，而是结构性就业难，只要高职瞄准经济发展需求培养人才，一定能站稳脚跟，突出重围。”他进一步指出，“高职不能躺在政策摇篮里面等饭吃，未来社会逐渐从学历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过渡，除了面向适龄生源，高职可以考虑向企业岗位培训、社会在职培训以及社区教育等方向转型，办学模式要多元化。”

（《人民政协报》2014年4月23日）

推动地方本科转型发展 打破职教“断头路”格局

“这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是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紧迫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快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4月25日，以“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为主题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2014年春季论坛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如此阐述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她同时指出，以此为切入口，我国职业教育“断头路、终结性”及高等教育发展同质化等困局将有望被打破。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就已启动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工作。2014年，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更是列入教育部重点工作。

鲁昕表示，今年将推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改革试点，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扩大地方高校在招生考试、专业设置、教师聘用等方面的自主权；并以此为突破口系统研究提出“十三五”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目标、政策措施和重大制度安排。

（《光明日报》2014年4月26日）

中德（青岛）职教合作示范基地揭牌

近日，由教育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主办，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承办的中德（青岛）职教合作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青岛举行，这标志着中德（青岛）职教合作基地正式落户青岛，这也是中德两国教育部继上海、重庆之后设立的第三个职教合作示范基地。

“德国的职业教育就是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线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农民，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王铨说，中德（青岛）职教合作示范基地将学习、引进德国职教课程、教材及教学模式、质量标准和国际通用资格证书体系。

据悉，中德（青岛）职教合作示范基地将以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轻工工程学校等10个核心成员单位为依托，以项目工作站模式进行运作。这10个项目工作站将因地制宜，创新适合自己的职教模式，为更多的职校学生创造升学和就业机会，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含金量。

（《光明日报》2014年4月29日）

江苏：近半地方本科院校将转职业教育

未来江苏省的职业教育，不仅只有本科生，还将会有研究生。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近半数将逐步转型职业教育。”4月15日，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省青联教育界别“转型发展职业教育”思想分享会上，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的一席话，引发了全省教育界委员们的热烈讨论。

“在德国，仅有20%的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而80%的学生则接受职业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华桂宏表示，转型期的中国，匮乏的正是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华桂宏认为，学校在转型过程中，专业设置也很重要，要让专业建设动态对接产业发展。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树白表示，中国的校企合作靠的都是校友等人情资源，跟国外相比，企业培训是缺失的，不想多花钱。我们安排学生实习，企业常说接受不了那么多，因为会干扰生产。但毕业的时候，又希望到我们这儿招熟练的技能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以税收等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与高职合作。”

（《新华日报》2014年4月29日）

陕西巡诊高校办学关键领域

一校一策引领错位发展

陕西省教育厅近日启动高校巡视诊断工作,24位专家将走进55所普通高校进行调研考察,围绕各高校治校办学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帮助学校找出“病根”、开出“药方”,逐步扭转高校“办学思路功利化、学科设置同质化、管理方式行政化”倾向,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据了解,专家组将在5个月内,对55所厅管普通高校(本科34所、高职21所),围绕人才培养中心任务,从教学工作切入,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办学思路、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管理运行、教育质量等情况进行分析诊断,坚持分类指导、一校一策和问题导向,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形成巡视诊断报告。

专家组只对每所高校号准脉、找对病、开出方子,为政府分类指导提供依据。同时,引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错位发展,真正把发展重心转移到提升质量、强化特色上来。

(《中国教育报》2014年05月20日)

两岸技职学生电子商务创业中心落户福州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与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日前联合在福州成立两岸技职学生电子商务创业中心。

据介绍,该中心成立后,双方将利用各自优质的电子商务师资团队,在两岸高职院校中率先开展电子商务创业的双向交流与交叉培训。依托福建外经贸学院业已开展的电子商务创业模式,构建面向台湾、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小商品市场的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带动两岸学子开拓优质创业项目,开展“抱团式”创业。两校今后还将通过这一平台,积极邀请闽台两岸技职院校“加盟”,共同推动两岸青年学子的互动融合。

(《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28日)

全国模具教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在宜宾召开

5月10-11日,由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教学研究会主办,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4年全国模具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四川宜宾顺利召开。本次会议旨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强化行业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加强行业指导、校企深度合作;研究、落实教研会2014年工作计划。

此次会议对高职院校模具专业建设、模具教研活动和模具职业教育与企业深度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路。

(《四川省信息》2014年5月12日)

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颁奖

5月6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颁奖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张榕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马培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吴启迪、李重庵等出席颁奖大会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选表彰活动创始于2007年,是我国教育战线针对职业教育设立的一个重要奖项。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选活动从2013年12月开始,经过逐级审核推荐、评审委员审核评议和社会公示几个环节,评选出“黄炎培优秀学校奖”59所,“黄炎培杰出校长奖”80名,“黄炎培杰出教师奖”110名,“黄炎培优秀理论研究奖”8名,“黄炎培杰出贡献奖”1名。

(《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8日)

第四届全国职业核心能力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10日至11日,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和北京桑博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职业核心能力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100多所本科、高职高专和中职技校的300多位院校领导和一线教师参会。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在会上表示:“职业核心能力已经成为人们就业、再就业和职场升迁所必备的能力,同时也是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综合素质提高的重要内容。因此,着力推广职业核心能力认证项目,不仅是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

周远清认为,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要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和职场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包含沟通交流、团队合作、自我管理、解决问题、信息处理、礼仪和创新等能力的职业核心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在全国推广的职业核心能力认证项目正顺应了教育改革的趋势,也符合学生素质提升的要求,为真正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研讨会上,多位参会代表作了主题演讲,交流职业核心能力的教学实践经验。此外,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徐莉等全国各地17名优秀教师还带来了关于自我管理、职业沟通等职业核心能力观摩示范课,展示其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

(《光明日报》2014年5月14日)

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在杭州成立

近日,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高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杭举行,中国高教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会长瞿振元、浙江省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出席成立大会,并分别讲话。会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当选主任委员。

本次大会以“素质教育与高职的使命”,来自全国80余所示范性高职院校、骨干高职院校近200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就如何在高职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践行立德树人分“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三个子主题进行充分交流。

栏目 / 高职动态

据悉，成立后的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全国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深化高职素质教育研究，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本次大会由中国高教学会、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主办，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会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

（《中国青年报》2014年5月4日）

- ⊕ 湖南工业职技校学生作品获巴黎国际发明展金奖
- ⊕ 贵州：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行
- ⊕ 山东商职学院迎来首批澳大利亚留学生
- ⊕ 陕铁职院过半毕业生提前一年搭上就业直通车
- ⊕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自主招生异常火爆 更多学子“恋上”高职
- ⊕ 全国职业学校“挑战杯”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启动
- ⊕ 数据称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高于重点大学
- ⊕ 青岛职教拓展国外合作项目 开设多项特色专业

学校到企业：路有多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访谈与思考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
——泰戈尔《飞鸟集》

四、学校和企业相隔多远

（一）从学校到企业：应然和实然的距离

“距离”在哲学意义上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物质和精神、外壳和大道不同。庄子在《德充符》里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从事物相异的一面去看，邻近的肝胆也如楚越那样相距很远；从事物相同的一面去看，万事万物又都是同一的。现代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写过一首名作《远与近》（你，一会儿看云，一会儿看我；我觉得，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这首诗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在空间，而在心灵。印度诗人泰戈尔更是在多首诗作中写到了“距离”这个命题。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中间有一段文字写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树与树的距离
而是
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在《飞鸟集》中，泰戈尔再次用花和果做比喻，写出所谓距离只不过是心灵的隔阂：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

隔阂是心灵的，距离是人为的。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在前言中关于教育与生活、育人与文化，以及“文化育人”内涵的讨论上面。教育本身就是生活，可是在教育者的眼中，

教育和生活产生了距离；文化本身就是育人，育人从来就在文化的命题当中，但是我们常常把育人和文化撕裂开来。

学校和企业有距离吗？本来是没有距离的，但是人们通过各种设置让学校和企业产生了距离。一方面是很远的“心灵距离”，一方面又喊“学校和企业零距离对接”。现实的情况是，校企之间林林总总的“零距离”都是“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形式很热烈，心理很冷然。借用泰戈尔的诗歌来说，应然的校企之间是“同根生长的树枝”，不过实然的校企之间“却无法在风中相依”。很多职业院校热衷于签订各种各样的合作协议，甚至通过“订单式培养”把学校办成了企业岗前培训班，但是学生心理仍然远离企业，许多学生刚就业就离职或者失业。

访谈了23个优秀毕业生，我从这些孩子身上感受到，也许他们曾经是被否认、排斥和嘲笑的，但是当他们离开学校、进入企业或走上社会之后，他们就显示出了未曾被发现的智慧。必须指出，他们的智慧、能力和做出的成绩都是在经历了这种挫折之后才获得的，这说明学校和社会之间有不浅的鸿沟。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询问了被访者这个问题：“校企距离有多远？”从他们对学校课程的建议以及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期待上面，可以看出，学校和企业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需要走（虽然在不同专业领域有所差异）。

【赵伟玉】蛮远的！真的，学校里安排的那种定岗实训（实习）用处不大。我在企业实习，师傅工头可以不管我，因为他没有从你学校拿到好处呀！说实话，在企业实习就相当于给学生放假。在学校的实训室实训还要好一些，因为有老师监控。

【李曾鹰】学校与企业的路有多远？我觉得比较远。学校学的主要是框架性的，比较简单，再者学校思维和企业思维不一样。

【陈文康】我的体会是学校和社会的路很长，距离很远，企业里客户很复杂，要求很多，所以的底子要好，各个方面要好。而且，企业对细节要求很严格，你马虎不得。不像学校。

【何翠芬】学校和社会的距离比较远，只有在企业，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责任感，什么是紧张，什么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在被访毕业生看来，校企之间肯定是有距离的，他们从自己角色变化当中的体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一种实然状态。毫无疑问，从差异的眼光去看，学校和企业不可能是同一的，学校就是学校，企业就是企业。问题是，因为我们从来都关注“外形”，在外形上确立校企合作，只能是学校迁就于企业或企业迁就于学校（通常是学校迁就于企业）。因此，当我们把目光全部对准社会生活，把教育和工作都看作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的时候，就找

到了校企合作的灵魂（超越了所谓“利益双赢”的思路），也可以说，我们应当从相同的一面看待校企合作。

学校和企业仅有一墙之隔，出了学校围墙就是企业！老师您说得对，看你怎么理解企业，社会就是一个大企业，学校和企业不是两回事，而是一回事。

上面这段话是老毕业生李海辉同学说的，前一句话是他的原创，后一句话是他对我的看法的反馈。关于校企合作问题，李海辉和我进行了深入探讨，我想他上面所说的，是校企之间的应然距离，但是李海辉仍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站在同一的角度来看，校企之间没有距离，并不意味着学校就等于企业，而是说，学校不能像孙悟空给唐僧画圈一样，把自己保护住，而是要在心理层面与企业（社会）融为一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校的职业教育来源于企业、高于企业，又回归于企业。

用社会学视角观察教育问题的开创者、法国哲学家涂尔干早就说过，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学校也不再是一种闭守的堡垒或浪漫的园地，而是一种能够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连接起来的具有真正社会意义的中介组织（见涂尔干《道德教育》编选说明）。教育即生活，但生活并非随性散漫，而是要善于生活。

（二）专业兴趣、目的性、专业性、实践性：关于复合课程改革的建议

学校课程设置问题，是本次访谈调研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本研究属于校级重点课题（“复合式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探讨”）的一部分，该课题的核心命题就是学校课程设置。“课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的所有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按专业或学科划分的具体的教学活动，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学校课程改革主要是就狭义的课程概念而言的。

在访谈中，我给学生简要讲述了我们学校的复合课程改革，其核心是跨专业学习，获得符合自己兴趣特长的课程的学分。我问学生对复合课程改革的看法，所有学生都表示非常好，而且每个人分别从自己在校学习体会谈到了他们为什么支持学校的这种改革。比如，我问陈国臻学校里的课程设置和工作之间有什么关系。他说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说他所学的化验、工艺、管道、计算、排水，做这个行业还是很密切。我给他谈了我们学校的拓展专业和三育人改革，他听了之后连说了两个很好。他说，学生可以多学一些，这是他的深刻体会。他举例说，像环保这个行业就比较综合，对电器的要求比较高，比如电控方面的知识就很重要，他在工作之后就考了一个电工，发现不懂电工技术不行。他补充说，他

们公司最近这几年就招聘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环境测试专业的。

不少人还根据自己的体会给学校课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2013届通信技术专业毕业生万睿则从比较宽泛的角度给了三点建议，这与万睿对这次访谈认真对待、精心准备有关。当我和万睿约定访谈时间之后，万睿就开始精心思考如何做好本次访谈了，他甚至向我三次强调，他有三个建议，希望我向学校传达。万睿说：

学校课程设置是合理的，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就是要多一些选修，但是有一些课程比如政治、语文什么的，学生睡觉的很多，关键是老师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开设一门课，让比较成功的师兄师姐回来讲，一周一次，每个师兄师姐回来讲一次或两次；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专业老师学生多一些模拟的案例，每个星期至少给一个案例让学生做，不要让学生闲下来在宿舍里打游戏；第三个建议是，希望学校图书馆的专业书稍微多一些，更新快一些，因为新技术更新快，学生想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最新的书。

其他被访者的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学生一定要有专业学习兴趣

【林睿】老师您谈到学校里的复合课程和跨专业学习，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但是所选课程一定要和自己所学专业挂钩，当然这是要建立在自己对所学专业感兴趣的基础上。不感兴趣的，和专业不沾边的，对于一个有兴趣选择本专业的人来说，为了拿到学分而选择，等于没有改革。

【李曾鹰】对于学校的课程，最重要的是自己要钻要专。

林睿和李曾鹰都是在所学专业上有兴趣，而且主动钻研的成功例子，他们的建议中特别强调了“专业学习兴趣”。这种看法是本研究的核心观点之一，本文在开始部分就谈到了“职业志趣决定成败”的问题。长期以来，围绕着书本学习和背诵答案的应试教育让大部分人被压抑了，他们的兴趣点没有被发掘出来，于是就漂泊在了社会上，而只有少部分人走向了成功，虽然这些人所学专业可能与他们的兴趣不一样，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兴趣和志向，走上社会后毅然放弃为了文凭而被迫学习的专业，转而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東西。

2. 学生一定要明确专业学习的目的

【陈文康】我觉得这个改革很好，这个只有在社会上碰壁之后才有深的体会。不过，对学生的要求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明确。

【庄俊源】比所学专业更重要的是目标、努力、坚持和发展。

【刘志雄】老师您介绍的学校复合课程改革，我认为非常好。我认为这个改革

要做好，学生必须知道未来三年我要做什么，要有职业规划，课程也要设计到这个方面的事情。我过去认为自己从事金融行业，就选择与金融特别密切的课程，比如会计、计算机等等，但是现在发现选营销、法律方面的课程其实也非常重要。学生学习要有针对性，知道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陈思伊】学校里面搞拓展专业，这个是很好的。像我当时就应该学商务英语口语的，但是没有把这门课作为选修，现在就是一种遗憾。既然学生可以自主选课程，那么老师就要给学生一个引导，让他们往一个方向发展。现在的学生没有我们当年的责任感，如果让学生自己任选，他们会选那些好玩的、有趣的，考试好通过的，我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因此，老师要有一个倾向性引导。

【何东梅】学校课程方面，我所学的商业银行会计课程完全没有用，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在必修课里面。税法方面的课程倒是要开设。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计算机，比如 excel 功能，我们所学的太简单，在图标和函数方面要增强。在社会上工作，说话与人际沟通非常重要，因此把说话技巧课程放在必选课程里面比较好。

关于专业学习目的，大部分学生是搞不清楚的。因此，我觉得专业目的教育在我们课改中应该引起重视。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其实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的教育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3. 不能弱化主干专业的“专业性”

【廖诞灵】很好啊，比如让声乐的学生加一点自己的伴奏，既会唱又会弹，多好。

【李冰】课程改革要有目的性，专业要保留，但是舞台的东西要变少，不过听说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总是，专业的目的性不强不行，这里一下那里一下，不知道要学什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就业的时候他们问，文化事业管理是干嘛的，要解释半天。

【刘源】网络的大趋势是融合、云计算、整体打包、全托管，所以你教学知识必须要懂网络的整体性知识。除了专业技术之外，一定要懂得职场交流，学会沟通协调，学会管理自己的项目。比如，一个毕业生来到公司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不敢说、羞涩，这样发展就不快，所以学校里要给每个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

【陈晓洁】我觉得先把自己的课程整好之后再去拓展，你自己内部很乱，还去弄外面的东西，那就乱上加乱。要重点突破，不能在专业上学了个皮毛，还再去学别的皮毛，免得浪费时间。只有好的作品，才有竞争能力。

主干专业的专业性不能弱化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专业必须要体现出它的特色出来，有特色才会有品牌，这种特色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专业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我们学校的网络技术专业就形成了品牌，其核心产品是 CCIE。品牌专业是通过学生的就业质量打造出来的。在访谈中，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生陈子琪就很自豪地说：

深职院的网络专业是一个品牌，甚至比很多综合性大学的同专业都要有名，不少单位就是冲着深职院网络专业的品牌而来的，特别是 CCIE。

4. 不能弱化课程的“实践性”

【赵建深】学校的复合课程很好，我当时就选学了计算机，现在就很受用，一些护师计算机都不会用，PPT 都不会做。我们学校的课程应加强实践和操作，因为护理方面更重要的是实操。当然理论是不可少的，比如当时进来的时候就考理论，但是实操也在面试的时候考，考的内容是做一次正规的护理。

【魏欣健】学校课程要和企业贴近一些，拓展专业方面，人际沟通非常重要。学校要多设置一些针对就业的课程，要有针对性要求，学生做项目就要做真实的项目，真的和假的在未来的工作中不一样，学校里的布置的练习作业其实用处不大。

关于实践性这个问题，下面一节内容我们将详细探讨。“知行合一”的理念，以及“学中做”和“做中学”的教育思想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民国时期的陶行知，它一直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既不时尚、也不西方，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学校教育中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呢？原因在于，在学校教育中有秩序地落实“生活化教育”，对教师的确是个极大的挑战，可以说绝大部分教师达不到这个境界，这也是我们的教育始终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把“做”与“学”结合起来，教师必须有新鲜的东西，必须是市场中人，特别是网络时代，新技术发展很快，教师越来越“难当”。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既是一个老课题，也是一个新命题。

(三) 实践和体验

我和被访者探讨“职业素养”这个问题时，大家都会说到“做人”、“沟通”、“责任”等等职业素养的要素，并且通过实例来说明这些要素对于工作的重要意义。这个时候，我总会追问：“你觉得这些素养在学校如何培养？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吗？”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会说，通过实践活动进行，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

【刘源】学生的锻炼机会不是课堂给的，而是在班级、学校以及更大的活动中锻炼、体验。

【赵建深】在学校里如何培养学生职业素养？有些课程也是可以的，比如我觉得肖志华老师的人际沟通课就非常好。也可以参加一些拓展项目，比如像我现在所参加的一些团队拓展项目训练。

【庄俊源】学校应该更多地教学生实践，给学生锻炼的机会。理论重要，但是实践更重要。要多点实战项目，多给学生和社会接触的机会。

我采访的都是优秀毕业生，他们都对学校里的贴近生活和工作的实践很认可。这说明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不仅是职业教育，任何教育都必须在生活中进行。当然，这也说明，学生的学习也都是实用主义的。

【刘志雄】我们学校比其他学校动手能力强，这个很好。在学校里的实践很重要，我就曾在校内“摆摊”，这个锻炼对我很重要，可以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

【李海辉】我们学校的实践很好，这个比其他本科院校有优势，对学生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去污水厂参观了不下五次。比如，李平老师带我们进地铁看顶管工程，这个参观给我后来做项目提供了帮助，我在做项目时经常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们公司，一个本科学生实践能力差，做事很懵懂，领导布置工作，本科生听完之后无处下手，而深职院的几个学生则很快就上手了。深职院唯一的缺陷就是大专层次，如何是本科层次，再加上现在的实践优势，那就非常厉害了！

“实践和体验”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优秀毕业生的共识，也是因为他们多年的工作中“实践和体验”出来的，这种获得性学习恰好体现了现象学原理：深入到事物本质中去。

在访谈中，许多人还谈到了他们对学校加强实践教学的一些建议。比如，陈英杰就认为学校的拓展专业改革很好，他说做印刷你也要懂销售啊，这是很重要的，即使纯技术的，懂销售也没有坏处。他说，希望我们学校有更多的贴近企业的实践，当然理论功底也要深，要知道所以然。

2013届通信技术专业毕业生万睿说：

建议学校里的设备还是要尽可能地向学生开放。许多设备学生没有碰过，在工作的时候就很不尴尬。由于我当时勤工俭学，还接触了一些，但是许多同学就没有接触。而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老板问我会不会光缆开天窗，我说不会，其实我学过，但是流行词不懂，后来问房老师才恍然大悟。这个也是吃亏的。内地的本科生就吃亏在对最新的东西不熟悉，而且没有接触过很多机器，所以就显得很笨，如果这些人不谦虚，爱吹牛，就很难在公司待下去，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本科生，不

到一个星期就被炒掉了。

虽然万睿毕业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很善于思考和钻研，而且在访谈前做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所以他的谈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思路清晰，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基本素质，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万睿一定能取得超出同龄人的成绩。

和2008届四年制楼宇智能专业暖通方向毕业生赵伟玉同学的对话也很有意思，他毕业不到6年时间，也不算长，可能也有不少同年的毕业生还在到处漂泊呢，但是赵伟玉给人一种非常成熟的印象。单从他的长相和打扮来说，也是那种初看上去就像个大师的人，再加之他言谈间似乎很谦虚，但又绝对自信，让你没有准备好应对的人很容易就被他的气势给压得无以应对。在谈到职业素养、课程改革和实践能力培养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说了许多，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建议。下面是我和他的部分对话内容：

【徐】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认为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赵】肯定是职业素养，我在深职院招聘学生，招了几个外地学生（我认为外地学生更能吃苦一些），但是即使是外地学生，也缺乏职业素养，来了不久就要离职，主要是嫌太枯燥，整天画图太枯燥。

【徐】你如何认识“职业素养”？

【赵】职业素养最重要的是责任感，专业技能差一点不要紧，可以补上来，但是没有责任感一切都完了。

【徐】伟玉你觉得自己在学校把专业课学得怎么样？

【赵】学的专业很浅，坦白说，对我工作用处不大，当时学校里很少实践技能，理论性比较强。其实，深职院在实践这个方面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不够。

【徐】多学一点理论，随着时间推移，好处会显示出来吧。

【赵】那当然，但是学校里的实践能力培养还是要加强。我们学校的老师虽然很多都是从企业来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地涉及实践，或者他们认为那些实践已经陈旧，总之他们淡化了实践，这个是我们学校的灵魂，必须重视，绝对不能丢。

【徐】你看问题的确很深入，也很有思想！那么我想请问，在学校里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赵】通过一些模拟项目，甚至真实项目来培养。我们公司的项目就可以拿去学校做，通过在学校里让学生做真实的项目让学生锻炼，只有这样的压迫才能做好。其实，在学校里比企业还好锻炼一些，企业里你给他压力太大，他就辞职了，而学校里毕竟要拿到学分嘛，他跑不了。还有，通过校企合作实验室来做。

【徐】你说得对，其实那些综合性大学，他们也在加强实践。不过就我所接触的，深职院的实践在全国的确是领先的，深职院不也培养了你这样的优秀学生吗？

【赵】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说，一定要在一个单位沉淀三年时间，我对我的手下团队说，你们不要跟我谈钱，如果你过了三年，想发展，我会推荐你去你想要去的单位，我在深圳的建筑设计界很熟悉，你如果不好好干，就不能在深圳这个行业混，哈哈，吓唬他们。我们的团队的离职率是零，我们的氛围好，只要好好工作，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毕业生的谈话中，我体会到，“实践”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一个活动或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虽然从认识论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个大概念，但是从实践精神的意义上来看待我们的学校教育活动，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必须“接地气”，职业教育活动更应如此，职业院校的教师没有实践精神，职业院校的文化不是实践文化，那么职业教育的存在意义就不明显。内地很多职业院校为什么出现找不到学生的“空心化现象”？为什么许多学生宁可读完“普通高中”去就业，而不愿意入读“职业高中”然后就业？其根本原因在于，内地有许多职业高中（甚至高职院校）不仅没有实践活动，甚至连理论也学不到了，学生在那里只能得到“读书无用”的结论。

五、关于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一）哪些人在读职业教育

哪些人在读职业教育？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视域，成为社会学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职业教育的实然状况是口头上受到重视、实践中受到鄙视。原来在精英大学做校长的纪宝成先生，在卸任原职后就任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会长，他就任后不久就发表了对职业教育现状的著名评论：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纪宝成的说法有数据支撑：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

占调查总人数的80%。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哪些人在读职业教育”这个论题，我在访谈中以漫不经心的方式特意询问了每个被访者的家庭背景。在我所访谈的23个学生中，只有3人的父母属于教师或者公务员，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属于社会底层的“小市民阶级”。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权威人士应当属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编陆学艺，他把中产阶级分成了两块：一个是“老中产”，即有资产、能雇用人的，比如中小企业主、中小农场主；一个是“新中产”，20世纪二三十年后，“白领”越来越多，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拿工资的脑力劳动者，现在的中产阶层大多为“新中产”。在陆学艺看来，“老中产”正在衰落，其实已经衰落，首先是他们在政治文化的操作中缺乏话语权。中国人看你是否有能力，往往是以办事能力来衡量的。比如孩子上学问题，真正有权的和有钱的孩子全部进入了“好学校”读书。哪些学校属于“好学校”？至少，职业类学校不属于民众心目中的“好学校”之列，否则，袁宝成说的那些话就没有意义，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也没有意义。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查阅了本校在读学生（医疗电子、包装技术等3个班，共112人）的家庭背景资料。为了便于统计，我仅仅选取了“父亲职业”这一项作为分析指标。统计发现，在校学生中，其父亲职业为公司职员24人、无职业的20人、个体经营的30人，在家务农的16人、公务员4人、经理或主管8人、教师1人、单亲家庭（随母亲，无职业）7人、其他（不详）的2人。如果我们把经理、主管、公务员、教师都算作“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入读我校三个专业的112名学生中，属于中产阶级子弟仅有20人，不足18%。总体来说，入读高职院校的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公司职员、个体经营者、无职业者和农家子弟，他们在教育获得的过程中被动接受了制度安排的结果，在就业时仍然缺乏通过关系在高起点上获得资源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制度通过合法的方式使原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也许有人会说，不错，入读职业教育的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人群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考分低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是反对者没有看到，许多考分低的孩子并没有进入高职院校入读，他们以不同方式进入了非职业教育（不一定是精英教育）渠道。虽然这些学生步入社会后有所分化，但是制度安排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出身论”。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考察了“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的现象，认为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与这些人在学校里的冲突性行为有关。这种观念在中国职业教育环境中也很有市场，比如职业院校任课教师谈到所教学生时，通常都是摇头叹息的。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全社会都应加以反思。”纪宝成在谈到职业教育问题时这样说。无论纪宝成本人解决问题的诚意有多少，也许他本人也是一个口头主义者，但是他追问问题的意识是值得称道的。本次调研中，被访人陈国臻同学说：“高中的时候对职业规划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就想考个好学校，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老师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样的理念，考个好学校，而不是职业规划和专业什么的。”在全部的教育活动中，人们如何幸福生活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考个好学校，所以教师们对职业规划之类从来不考虑；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孩子未来的希望肯定都是高大上的，因此，职业规划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的教育制度安排满足了这种需求——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发展，而每一所高校都想成为“一流大学”，都想吸引“好生源”！教育不公平就在这个“公平竞争”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试想，谁愿意上高职院校呢？凡是进入高职院校读书的都是无可奈何的“差生源”。

大众化教育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是人们在观念上仍然没有改变。我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因为观念保守、节拍混乱，人们就在“层次论”和“类型论”的区别上面大做文章、在“学术型”和“技能型”的创新上面洋洋得意、在“育人”或者“制器”的“特色化”道路上随“风”飘扬。如果不澄清一些东西，越强调职业教育的“特色”，恐怕原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可能性越大。就此而言，挖掘出职业教育本身的文化元素，强化“文化育人”对于职业教育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教育时报》（2014年4月11日）刊登了一位留学博士生的越洋来信，我觉得点出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文章的作者在深圳长大，高中时因不满教师教学水平低下，而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在大学仍然不满教师教学，继续自学，最后凭本科学历申请攻读澳大利亚某知名高校物理博士学位，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中国教育界最近有高官说，应修改教学大纲，缩编高中物理化英的内容，弘扬语文及国学。对于大纲里究竟哪些知识该删，哪些该弘扬，本文不作详细分析，因为这并不是中国高中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此外，最近还有声音说，未来要把高考分为“技术型”和“学术型”。对于这座想法的荒谬性，本文亦不做详细讨论，因为以现在的教育，教不好“技术型”和“学术型”中的任一种。

其实，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大纲，也不在所谓“技术和学术之分”，而在于教师素质以及教材质量。任何官员，如果把问题归结于大纲或所谓“技术学术之分”要么说明他（她）极愚蠢，要么就是他（她）在故意误导公众。

先讨论教材质量问题。由于作者对理科较为熟悉，所以只讨论理科。

国内教材的问题之一是，对知识的哲学本质讨论过少。众所周知，理科产生之初，是哲学的分支，与人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能赋予人以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可惜那些学科在现代中国被工具主义“物化”了，只强调现实功用，而忽略对其美感的感受。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物化的实证，这句话流传过广，深入人心，导致中国人一看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是生产力。估计这种思潮也影响到教材编者。

也许作者的不少观点不乏偏颇之处，但是我认为它所点出的症结没有错。职业教育的时代环境已经变化了，但是许多人仍然津津乐道于职业教育的旧观念，让所谓“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形式主义到了变态的地步。我认为，让“文化育人”的理念进入职业教育是完全正确的，是一种顺应时代的伟大选择，是教育回归其原本的意义。但是，如果用行政化的方式推进“文化育人”又会落入形式主义的陷阱，其表现就是把“文化育人”看作职业教育外面的东西，然后想法设法让外面的进来（比如，为了讲座而讲座、为了文化而活动，在教学中增加职业道德元素就等于文化育人等等）。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失去了职业教育本身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歪曲了文化育人的本意，再一次偏离了教育本真。

其实，文化育人不在职业教育外面，而在职业教育里面，原本的职业教育课程中就是文化育人，关键是如何将之呈现给学生。如何让职业教育内在的文化育人显明自身？我所调研的优秀毕业生的答案是：实践和体验。用上面这篇越洋文章的话说，就是要重视教材建设——把知识的哲学本质挖掘出来。本研究报告的前言部分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懂得“课程哲学”，就懂得“文化育人”。

（二）高职与本科

高职和本科，前者是所谓“类型概念”，后者是所谓“层次概念”，两者如何能并且在一起呢？本文之所以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探讨，是因为我在调研中，被访对象总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谈论。在他们那里，高职和专科生其实是同义词。

早先，我和庄俊源交谈时，他不断提到专科生、本科生，从来不提职业教育。我对此感到奇怪，就问庄俊源为什么要这样表述。他说，对于学生来说，关心的不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而是“大专”还是“本科”；用人单位也不因为你是职业教育或者普通教育而给你定薪，而用文凭的高低定薪。在庄俊源之后，我和其他毕业生谈话时，就特别

留意问关于“高职”与“本科”的相关问题，得到的回答与庄俊源大同小异。比如，李海辉就说：“深职院唯一的缺陷就是大专层次，如何是本科层次，再加上现在的实践优势，那就非常厉害了！”

陈文康既是一家大公司的项目经理，又有自己的创意公司，作为管理人员，他如何看待“高职”与“本科”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大专生”和“本科生”还是有差异的。他说：

计算机行业有些职位我要的是本科，比如数据库加固师，他们的基础很扎实，学历高的人他们在中学就不错，是学霸，综合素质不错。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甄别的好办法就是本科和专科。你大专再怎么学，三年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时间，第一年为基础，第二年就是大杂烩，第三年就工作了。

魏欣健刚刚毕业，他是这样说的：“本科主要是理论性的，我还没有读。虽然在技术方面专科和本科都是一样的，但是本科一进来他们就可以做前期，而我们只能做后期，这个不一样。就拿编导这个专业来说，即使你专科生也学，但是含金量也不高。”

魏欣健在电视台工作，属于国企。何翠芬在中国联通工作，也属于国企，她的观点是：

单位看着的是业绩和能力，这个反映在待遇上面，但是要升职、转正，都要看文凭，这个在国企更突出。转正后，工资当然会高一些。学校学的专业技术基本上有用处，但是用处不大，考的证书基本上没有用了，因为现在技术发展太快。当时我们学的是2G，但是现在已经是4G了。所以，并不是你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人家就特别看重你的专业技能。与此相比较，人家更看重文凭的高低。

何东梅在深圳检验检疫局下属公司上班，她说：

在起点上，文凭还是很重要的，后面就看你的文凭和职称。我们的职称是通过考试获取的，我现在正在考职称。现在的工资加年终奖，每月大约能拿到5000多吧，肯定与职称和文凭都有关系。多亏我在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是自考的，当时17门课，全部合格。

如果说国企和事业单位重视文凭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对文凭有没有要求呢？陈国臻就职于一家私人环保企业，他说：

我们公司现在招聘已经降低要求了，以前招聘的研究生、本科生干了几年，公司花费成本培养，但是他们只是当作跳板，跑人了。所以公司现在看中的就是专科生的扎实。

在谈话中，我注意到，陈国臻始终强调的不是高职、技术，而是“专科”。这说明，

文凭的意义在民营企业中的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那么,深职院学生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很多企业欢迎深职院学生的理由是什么?通过和一些负责招聘人的毕业生交谈发现,深职院学生动手能力强是一个方面,而作为专科层次的学生,深职院毕业生能够专心于自己的岗位及薪酬,不存在眼高手低的问题。还有,深职院学生毕竟在深圳成长,熟悉深圳市场环境,人脉关系广。总体来说,如果在专科层次上谈论,深职院学生具有绝对的品牌优势。

无论如何,文凭在市场中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学校学生就不会热衷于考取本科了。这里,我们讨论“高职”与“本科”问题,不仅因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更涉及到我们对职业教育“文化育人”的认识,以及对职业教育未来前途的判断。

(三)方向与抉择

1. 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认为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后工业时代”。谈论职业教育的改革,“后工业社会”比“后工业时代”更妥帖一些,因为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职业形态上可以较好地把握职业教育的本质意义。但是,“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比如西方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后工业社会”哲学思潮,而且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程度而言,区域间发展很不均衡,因此很难用一个词准确地界定当代中国的“社会”特征。即使我们从“时代”特征来把握,也无法精准地总结出一个科学的词语。比如,用“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制造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后制造业时代”这些概念似乎都可以描述,但似乎都不妥帖。比如,还可以说“旅游休闲时代”、“微信时代”、“文化创意时代”、“养生时代”等等。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本研究的观点,我还是选取了“后工业时代”这个语词。我想,这个语词即使不够科学和妥帖,还是能够相对较好地概括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特征: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快速发挥和物质积累后,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而且正在经历金蝉脱壳的生命状态,传统的工业化经济运行模式肯定行不通了,只有进入一种新的经济生态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之所以选取“后工业时代”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在内涵上包含了“信息化时代”、“后制造业时代”等等概念。如果我们把工业化和制造业相对应的话,那么后工业就是与“信息化”、“制造业”相对应的概念。

2. 职业和技术的存在方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人是职业的存在,也是技术的存在。职业和技术的存在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所以人的

存在也在发生变化。职业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职业和技术的存在方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事实上，这种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电子商务、微信、3D打印、随时随地沟通无极限……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保罗·麦基里认为，传统的制造业已经被数字化取代了，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了！

18世纪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用纺织业工厂机器生产取代了作坊手工制作)；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的以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创了规模化大生产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体现了“工业化时代”从开端、发展走向鼎盛的过程。主要还是“工业化时代”，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它的经济模式都是以机器制造业为核心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其关键词是：石油、煤炭、森林、水泥、车床、模具、师傅、手工。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在美国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全世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大规模流水线制造业终结了，这是数字化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后工业时代”中，制造业消失了吗？准确地说，传统制造业正在消失，而新兴的智能化、数字化制造业正在产生。比如，柯达照相机在数字化时代被淘汰，而当手机全智能化之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知名品牌因为没有改变而销声匿迹了等等，那些数字照相机也逐渐被淘汰了——不创新就是死。再比如，在商业经营模式中，工业时代是小卖部，后工业时代是 shopping mall，是电子商务、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等。后工业时代，制造业进入了新形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

3. 职业教育是否准备好迎接新时代？

“从学校到企业有多远？”本研究提出这个命题并非心血来潮，也并非仅仅考虑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步履艰难，而是着眼于由此出发，看到职业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在新时代的曙光喷薄而出的时候，如果还不能从陈旧意识中清醒过来，将成为可笑的落伍者。我常常想到这样一个事件：很多旅游者千里迢迢爬黄山、看日出，但是当日出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因为沉溺于香甜的睡梦不愿意起床，而耽搁了千里迢迢爬黄山的重要目的——看日出，这难道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为了说清楚职业教育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和特征。职业教育起源于“为穷人的教育”。在18世纪的西欧诸国，大工业生产愈来愈盛，被剥夺了土地的劳力者全部进入了工厂做工，而他们的孩子却无人照顾，此前这些孩子也无权读书，因而出现了流浪、破坏、死亡等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开始为这些孩子建学校，瑞士伟大的教育家佩斯泰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为流浪儿开办的学校闻名世界。

这就是职业教育的起源。因此，职业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工业化特征越明显，职业教育特征越明显。换言之，职业教育被重视是和技术在工业化社会所向披靡联系在一起的；职业教育的问题也是和技术被极端肢解密切相关。我们说，职业教育依附于传统制造业，它让动手操作、劳力、蓝领等等受到“教育机器”的青睐，但是传统制造业即将被以3D打印为核心数字制造业所取代，而与传统制造业相对应的职业也不断消失，就此而言，职业教育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粗放式工业化模式之后，必须转型升级，但是现在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多，可以说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事实上，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就一方面高歌猛进，一方面积累风险，现在到了一个硬着陆和软着陆的关键期，解决不好，转型就成了空。职业教育工作者应该有广阔视野。

4. 从“用工荒”现象看，职业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说前面几段文字中谈论的“职业教育新时代”有些高飘的话，那么我们通过“用工荒”这样一个与职业教育直接关联而且迫在眉睫的例子来谈。

自从2009年春节过后中国大地第一次出现“用工荒”现象，至今年已是第6个年头，“用工荒”几乎成为每年春节过后新闻报道的例牌菜。2014年节后形势也不例外。我特别注意到。《新快报》（2月12日）曾经以“节后又见用工短缺，月薪4000难招人”为题，报道了“广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城市企业下足功夫揽人，但应聘者观望气氛仍浓”的现象，在珠海，“为了招揽工人，企业之间打起‘价格战’，有企业招聘普工开出了4000元的月薪，并扬言‘连临时工、小时工也来者不拒’”。看来，曾被中国企业津津乐道的“民工潮”的确一去不复返了，代之的似乎是“用工荒”的常态化。

所谓“用工荒”的“工”，主要是指在传统制造型企业就业的低端人群，随着教育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传统“低端人群”越来越少，新生代对就业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还停留于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赚钱的思维阶段，肯定难以为继。这些年来，各地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用工荒”，但是效果不佳，这说明企业实现转型并不容易。企业转型、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源之间存在着高互动关系，比如，企业招不到最适合的人才，自身的创新和进步就比较难；而企业不进步，受了教育、要求增多的人才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如果市场上出现比较严重的“企业缺人”和“劳动力失业”并存现象，相对于表层的“用工荒”来说，这是更为可怕的。

由此，我想到了职业教育的责任。面对人力资源市场的这种变化，作为“培养深受企

业欢迎的技能人才”职业院校绝对不应该沾沾自喜于“高就业率”了，即使“就业率达到100%”也不能说明培养质量高，因为毕业生稍稍降低要求就能找到工作。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职业教育应当转变思想和担当责任，把人才培养思路从过去的“适应市场”转向“引领市场”。

办好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去职业院校实施这一理念的惯性做法是“学校教育适应市场需求”，“适应”一词把学校教育放到了被动者的地位，其结果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和企业的创新需求发生错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人才供求上的“错位”延缓了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透过“用工荒”现象，我们看到的深层问题是，“适应型”和“工具型”人才不利于企业发展，这种不利将造成连锁反应。

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市场，在人才培养理念上应当担当“引领者”的责任。企业因“缺人”而使发展受阻，职业院校此时不是这种“缺人”的受益方，而应当及时和企业站在一起，甚至“先企业之忧而忧”，通过人才培养来帮助企业实现转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这就是说，职业教育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虽然，这个概念作为口号经常被宣传，但是在“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的理念下，“创新型人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虚化了。站在“引领市场”的高度上培养创新型人才，职业院校不仅要从传统的“就业率”情结中走出来，而且要从“专业对口率”恐慌和“离职率”恐惧中走出来。否则，职业教育自以为是地举着“适应市场”的大旗，紧跟在企业后面亦步亦趋，甚至还要以“就业率”、“对口率”和“离职率”束缚手脚，那么，最终将可能出现企业和人才“双输”的局面，这不是教育的本质追求和责任担当。

5. 把“文化育人”作为职业教育转向的按钮

后工业时代、后职业时代和后职业教育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时代，“规模化”向“个性化”转移，表现在经济上就是“产销一体”，这是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观点。软件设计专业毕业生李曾鹰之所以在创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功，就在于他的产品设计完全迎合了“产销一体”的个性化商品经济（集中表现于电子商务）。随着网络时代使知识呈现发散状态，单向的只是标准化训练已没有意义。

在职业岗位变化越来越迅速的情况下，专业越细分越违背技术知识的整体性。因此，传统职业教育中，岗位技能训练所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根本追上市场的脚步。近20年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课程建构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以京派以姜大源研究员为代表的“京派”力量；另一股是以石伟平为代表的“海派”力量。“京派”力量和“海

派”力量的共同点都是，把建构职业教育课程的思维建立在传统制造业时代。两派的不同点在于：“京派”力量的核心思想是工作过程系统化（归纳法），出发点是岗位技能和典型工作任务，试图提升工作知识的地位，其知识传授是碎片化的；“海派”力量的核心思想是把课程内容项目化（归纳法），出发点是工作项目和任务，其知识综合性较强。两派的同是大同，异是小异。

我们说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纯粹的工业化教育，它与前工业化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都有关系，按照胡塞尔的“时间意识流”理念，前工业化时代为职业教育做了“前抛”，后工业化时代还有职业教育的“保持”。过去的并不过去，未来的并不未来。在社会学意义上理解，难道职业教育仅仅是“我学技术”、“我接受训练”和“我进入工作岗位”吗？职业教育必须体现出“人”与“工作”的和谐关系，我们所强调的职业教育课程哲学其实就是探讨这两者的关系，职业教育一开始就面临人与工作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融洽的，而不是对抗性的。

既然专业越细分越违背技术知识的整体性，因此，复合课程正是对专业细分的矫正。在根本意义上，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是“职业幸福感”，而基于“职业幸福感”的职业教育一定要回归本真：生活。如何具体地涉及改革呢？前文已经谈了很多，比如，通过“项目化课程+实践性学习”推进教学方式改革；通过“1(基础课程)+N 拓展课程”推进复合课程改革；通过“全面学分制+弹性学制”推进管理体制变革。其实，我们学校所推进的“文化育人”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解决“教育行政化”这个制度性问题，改革就会走过程。用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的话说，教育只有在民主主义体制下才有“本真意义”。

（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 徐平利）

精神重建与中国职业教育选择

人类对教育的作用充满期待，因为教育所具有的独立品格和精神追求，不仅仅是服务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塑造和培养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的人，做出引领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因此，立足于全球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两大现代性难题的背景下，面对中国经济启蒙未竟而遭遇的价值迷茫，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如何批判地审视中外经济发展之现实，如何深入思考职业教育与工业文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影响的精神实质，从而做出中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实践路径的理性选择，不仅仅是职业教育服务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更是引导“准职业人”寻找职业的意义支点，丰富和健全主体性职业自我，从而建构起整全的个人精神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理论诉求。

一、精神重建：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的省思

1. 复苏乏力与精神失落：世界经济格局之现实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接踵而来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最近各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数据表明，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已经见底，但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似乎仍然扑朔迷离，长路漫漫。伴随结构调整的波动与阵痛，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后现代社会“生产决定消费”向“消费主导生产”的转换，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内涵的更新。“生产决定消费”意味着“已经产出的价值”是人类进行消费的前提和对象；而“消费主导生产”则意味着一种对“还未产出的价值”的心理预期，体现的是一种“欲望价值”。这种转向使经济的内涵不仅关涉制度、技术，更关涉精神。

当下在经济问题上最为深刻的一个矛盾，是经济发展意识框架中人类的精神境界问题，因为经济市场并不完全是一个机械的、牛顿式的、仅仅符合自然法规律的物质机理的世界，人的主观精神始终交错于市场的所有时空和交易行为中。伴随着人性物欲的冲动，不断冲破劳动价值论公理的束缚，将客观的市场原则完全主观化、幻觉化，经济作为人类意识的感性存在对象化的异化劳动产物，必然将市场推向危机的边缘，而经济的幻想则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就目前国际经济形势而言，重建怎样的精神财富来修复现代性把神性化的人转向俗性化的人所导致的人性缺陷，成为西方国家关注人的生命意义

必须面对和反思的形而上问题。

2. 经济奇迹与精神物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隐忧

改革开放30多年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1980年至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36倍，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2%上升到了15%。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大大超出预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从2002年的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位，目前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朵奇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表明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转型”的巨大成功，中国逐步转向一个以市场驱动为主要增长路径的更加正常的经济体。然而，正是由于第一次“转型”的重点在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因此，GDP的增长成为“转型”的首要目标，至于社会的其他方面，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经济变革下的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文化心理、精神生活在功利主义的撞击下，迷失在种种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之中，教育、文学、艺术等需要自由和创新的领域亦为强大的利益结构所绑架，人们的幸福感随着物质水平的增加而进入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拐点。第一次“转型”虽然创造了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精神物化”，这种精神的“普遍困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当代中国如何重构和培育足以掌握与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既是第一次“转型”后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的自发要求。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格局，如今已经十分明显的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取决于精神—文化的开拓性建设。如果说，这一精神重建将积极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那么它就必定会意味着人类整个生存方式的“新启蒙”，同时也意味着经过人类的合理导向，现代文明真正的意义世界能够完成一种新型的自由和富裕的承诺。

二、技术抑或精神：职业教育与工业文明历史逻辑的理性追问

1. 技术的精神意蕴

准确地说，技术至少有两个维度：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和工具属性来理解技术的本质；从生存论角度澄清技术的精神内涵。前者是现代社会所高度关注的；相形之下，后者往往被严重地忽视，“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技术还与精神有关”。实质上，技术这一最实在的

物质产品，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彻底地固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它所展现的特点和灵魂是人类自我的一种创造和表达。在古代，技术与精神体现了原始的和谐，技术制品体现了极丰富的艺术要素与文化要素，并且技术的表达与实现，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及其体现的价值观念的潜意识之中。因而，古代技术是人的一种在世方式，通过技术活动使人“存在于世界中”，它表征着人类的生命形式与自然的原初形态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的样子的条件”。

近现代技术的扩张打破了这种生态平衡的局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进而工具理性扩张，价值理性萎缩，技术的工具理性成为了技术意识形态。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当代技术进入了一个反思的阶段，它已不能仅仅一般性地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应当反思人类行为对整个地球的影响，包括它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指的是当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市场的扩张，一种在开端和结果上都不再属于人的控制范围的技术垄断正在兴起，技术已经冲破了精神信仰的樊篱，使人类生存的形式屈从于技术至高无上的权威。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活力大大萎缩，而且导致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现代与传统之间渐行渐远乃至疏离，这对于现代文明将带来不可逆转的、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对技术形态的重构，关键的症结在于恢复人类生存更广泛的智慧与情感，自觉培养人类对人造物世界多样性的正确评价，同时重构一种灵活机动的、可修正的、面向未来的、在构成人类社会主导性力量的技术、价值选择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中进行诠释的技术进步观，从而恢复调动技术本身所赋予的反霸权特质，即人类用“人”的意义和人本身来引领技术的自我拯救，通过自身的行动建构起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活世界。

2. 追寻职业教育与工业文明历史逻辑的精神立场

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工业文明的诞生，终结了学徒制度与工匠传统的职业教育形态，导致了技艺传承形式的根本性改变——与来源于古老经验主义的技术相比，一个完整的经验学习被“开发出一种将工作程序划分成几个单一步骤的新的技艺”，“任何一个不熟练的人也能学会和完成这样的步骤”。而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生产线上的工人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因此也成为学校“接管”训练“机器的人”的企业培训。毫无疑问，“训练性的职业教育”迎合了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批量人才需求，同时，在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征使得技术问题在深层次上不断成为人的再生产问题，即人必须接受“训练”，以便借此才能顺利进入工业文明的“技术系统”。

应当承认,基于“教育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支持”这一思想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经历的必由之路。然而,诞生于工业化背景中的职业教育,从诞生之初就指向了机器上的操作工,代表着低层次的劳力阶级的教育,背负着沉重的“工业经济附庸和政治权利奴婢”的思想负担,尤其是“教育双轨制现象”的形成,更是从国家教育制度的层面,固化了“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身份不对等。虽然时至今日,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已经形成,然而一种缺乏精神内涵的“训练”印记始终存在于职业教育的成长过程,职业教育的“教育性”特征仍然不够鲜明。此外,职业教育一直以来默不作声地坚持将自己的地位“高移”,试图像学术类及工程类高等教育那样以培养精英的模式来操作的现象,虽然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人才需求“高移”的客观事实,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职业教育潜意识当中摆脱“训练性”标签、提升“教育性”品位的期许和努力。

实质上,职业教育在现代技术语境中所表现的困顿和不安,同它与传统技术在精神上的深刻断裂密切相关。因为现代职业教育在物质形态上的诞生,只是表象上的“技艺自由”时代的来临,其孕育的土壤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需求,而不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进化。所以当我们全然地运用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探究职业教育与工业文明的历史逻辑,常常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历史前进了,精神在本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究竟是职业“技术”的教育,还是职业“精神”的教育?当技术的衰变期变得越来越短的时候,精神的力量是不是也在快速衰竭?事实上,追寻职业教育与工业文明历史逻辑的精神立场,关键是回归人是历史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作为目的的人的内在素质出发,建立职业教育与技术情景的互动,抵抗工业文明时代的肤浅与失度,重建职业教育的尊严与深度。

三、走向精神重建的中国职业教育选择

1. 职业道德规约下的职业能力培养: 职业精神教育观达成的基础

境界是经人“觉解”而形成的一种意义世界。冯友兰认为,所谓意义是与人的主体性即“觉解”密切相关的,人在从事具体活动时,指向对象的理解与自我反省意识的统一,便是觉解。觉解作为人的存在之维,不同程度的觉解,展开为不同境界的意义世界。而教育恰恰是要引导受教育者对意义世界的觉解与建构,“教育的归趣,亦可谓‘觉’境的求达”。职业精神教育观的确立,正是职业教育通过启迪人自身对职业的觉解,从而赋予职业更高的精神意义,由职业能力之径通达自由精神之境,其过程涉及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三重境界的内在价值意义。

职业能力展示的意义涉及“是什么”的追问，即职业能力将职业世界纳入有序的构架，它的表述提出了学习者的一种确定的认知结构图像，使之能够为人所理解和掌握，并由此构成了职业活动可以展开的前提。比如德国职业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基本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关键能力）两个层面，每一层面又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内容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要求。这意味着通过对这些职业能力的把握，受教育者便可以达到从事职业活动的客观要求，从而获得谋生的技能。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着力点主要在这一层面，职业能力本位观恰恰迎合了“市场需求，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因此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现实存在和发展的主导理念。职业道德以主体的价值观念为内容，展现的是“意味着什么”的评价过程。从把握职业世界的方式看，单纯的职业能力并没有包括职业的全部规定：它略去了职业所涉及的多重关系以及关系所赋予职业的多重规定。作为人所理解和从事的职业，它无疑更多地表现为在不同视域下，职业对人“意味着什么”，后者进一步将职业的意义世界引向价值之域，具体地指向人与职业的价值关系。实质上，职业对人呈现何种价值意义，与道德主体具有何种职业理想、接受何种价值原则往往难以分离。比如公正、诚信、责任等社会共同的职业道德规范，意味着具有普遍内容的职业道德意识可以为不同的个体所共同理解、认同和接受，这也为职业教育走向职业道德境界奠定了教育的依据。从现实过程来看，目前传统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抑或是校企合作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力训练”和“道德培养”的两难问题，在师资、课程、实施等方面依然呈现出“强调职业能力培养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性”与“提升道德境界对职业教育育人的本质要求与意义”的二元对立局面。

职业精神境界从价值的目的之维展现了职业“应当是什么”的自我反思。职业“应当是什么”的追问，体现的不仅仅是对职业价值的判断，更主要的是对职业价值世界的构建，是以“应当承担什么”为内涵的使命意识，更多地从人的责任、人的义务这一维度表现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因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提升到职业精神的层面，是对人的主体性培育、职业世界精神信念重塑的有意义的路标式的引领，在这种引领中达到“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人性发展的方向统一”，避免职业异化为外在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职业精神在融入现实职业活动的过程中，超越了抽象化与玄虚化，基于人自身存在向度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发展，进一步丰富职业精神的价值内涵。职业教育的三重境界在职业实践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获得统一的形态，使人的各种可能性向人自身无限地敞开，使人能够摆脱“职业”束缚与“自我”束缚，自由地把握职业对象和把握自身。

职业道德规约下的职业能力培养是职业精神教育观达成的基础。职业精神教育并不简单对应于或者对立于职业教育中先行的职业能力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它是以人的职业精神发展作为教育引导的综合性职业教育行为。就其现实形态而言，精神教育无法离开“成人”与“成事”的过程，这不仅在于精神教育以“成人”与“成事”为指向，而且表现在它本身形成于“人事合一”的过程。从职业教育的视域看，“成事”的过程首先表现为学习者作为实践主体意义上的职业能力形成的过程，而目前“工作过程导向”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态，这为职业精神发展从潜在的多种可能状态向现实发展的转化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同时，职业能力形成过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人在确证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相互作用中，表现为价值目的意义上的德性主体。也就是说，“成人”而不是“成材”、“人化”而不是“物化”，这才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追求的境界。目前，“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观影响下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过程，往往缺乏内在的价值承诺和理想的引导，成为职业教育缺乏“教育性”的重要根源，所以职业道德规约下的职业能力培养，应该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反思、批判和重构的研究主题，并在职业世界精神意义的引领中，获得生命意义的领会与生命境界的提升。

2. 重构项目课程审美化：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自1983年德国的“双元制”引入我国之后，世界劳工组织MES课程、加拿大的CBE课程、澳大利亚的培训包、英国的BTEC课程以及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陆续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借鉴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模块课程（理论模块、实践模块）、宽基础活模块课程、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项目课程等课程理念。目前，项目课程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解构学科体系、重构工作过程导向课程体系的重要载体，其教学过程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性，是职业教育课程正视自身发展的“一次变革”，即从学科课程到项目课程的变革。项目课程的教育内容在具体实施操作的教与学的活动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对于学习对象的外在性：教师呈现出的教学内容更多地是以就业为目的的操作技能的传授，面对这一过程，学生掌握的只不过是外在的生存手段。因此，目前的职业教育过程较少成功地促进学生由职业技能走向职业精神。

克服这一“外在性”的路径是项目课程的审美化重构，推动职业教育课程的“二次变革”，即从项目课程到项目课程审美化。正如职业教育课程的“一次变革”过程一样，项目课程审美化并不是对项目课程、教学法等教育过程的完全替代，而只是“内在地借鉴审美精神”对同样的学习内容进行智慧处理。智慧处理过程的理论依据，体现为重新审视职业世界中人与职业对象之间的关系，将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

关系，复归到更高意义上的艺术审美关系，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人这种“赋予活动”“美的尺度”的能力，不仅使项目课程的审美化重构成为可能，更使审美化的项目课程成为职业教育超越“训练性”、回归“教育性”的实践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内在地借鉴审美精神”对项目课程进行审美化重构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审美课程或者职业教育美学课程。审美课程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审美、创美的教育过程去提高教育对象的审美情趣，内容是纯粹的审美活动，而项目课程审美化只是要求教学活动的美化取向，其终极目标不在于美，而在于具体职业教育目标的达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不是项目课程审美化的目标，而是手段。同时，项目课程审美化也并不只是从美学的角度，以美为工具、以教育效果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美学课程，若仅限于此，最终将沦为一种工具理论或者是职业教育课程的新增内容。实质上，审美化项目课程的生命力在于其不仅仅是以审美特征去追求职业教育效果的改善，而在于它试图以职业教育美的建立去提升职业教育及其对象的职业精神境界，使职业教育活动本身成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达成过程，使教育活动的主体实现生命的超越。

关于项目课程审美化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呈现的形式合乎美的规律，通俗地说，职业教育内容好似一部以工业文明发展为主题的视觉效果唯美的电影，教师导演，学生参演，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呈现出工业文明的智慧美和文明工业人格的形象美，通过与美的形式同构同形的呈现方式，使学习对象实现观照工业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职业情感、职业责任等内在意识；二是创造一种“学生可以从主动活动到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达成精神层面共享”的体验的教学活动形式，包括教学活动的环境美化、情景创设、教师职业观的榜样力量、艺术形式的直接利用，如将动画、电影、文学作品等引入教学过程，学生在“活动—体验”过程中学习、反思、理解、感悟、发现、整合、建构，促使主体性认识的自我经历、自觉生成。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艺术化手段的运用如果忽略运用教育规律的主体自由，不能够实现教学双方“施展自由”的目标，形式上的“美”就只能是成为另外一种异己的力量，无益于学生的能力发展和精神享受。

（《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8期）